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学 术 讨 论 会

0115



论我党的基本历史经验——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姜汉斌 赵小芒 许志功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室

1991年7月

内 容 提 要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是历史的选择。作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以二十世纪初人类已经进入的时代为宏观背景，从全球角度来观察问题。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主义由以产生的矛盾，以特殊而尖锐的形式在中国社会表现出来，中国社会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包含着东方落后国家同样可以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同样具有强烈的认同感。第二，结合是复杂的创造性工程。指出结合不是简单的“对接”，而是在实践基础上把理论与实际、共性与个性、坚持与发展具体地、历史地统一起来的过程，是一项包含着复杂矛盾的浩繁的工程。其创造性主要表现在科学地认识结合的两个基本方面，正确地处理结合的两个基本过程，实现双向创新，并且要随着实践的发展驾驭好它们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第三，必须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我们必须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反“左”时防右，反右时防“左”。这是实现结合的重要保证。

论我党的基本历史经验——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的70年，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和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而奋斗的70年。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我党的一条基本历史经验。党在各个时期的成败得失，无不与这个问题上的成功与失误密切相关。在纪念党诞生70周年的时候，总结我党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推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史的选择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什么对发祥于西方工业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巨大的亲和力？或者说，发祥于西方工业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具有强烈的认同感？

这是一个前提性的问题，也是一个经常引起争议的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以二十世纪初人类已经进入的时代为宏观背景，从全球角度来观察问题。离开整体而管窥局部，忘记联系而孤究一端，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我们知道，早从十七世纪开始，人类社会已经开始步入资本主义的门槛。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取得了世界性的胜利。东方落后国家的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而发生了显著变化，被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就描述过这种情景：“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①

这种情况，马克思称它为西方资产阶级的“双重使命”：一方面是破坏的使命，它破坏了东方社会传统的自然经济，在“亚洲式的专制”之外又加上“欧洲式的专制”。另一方面是“建设”的使命，西方资产阶级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在东方奠定了类似西方式的近代工业，造就了西方式的产业工人，同时使这些国家的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卷入了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之中。

这样一来，在东方落后国家便形成了双重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在国内，工人阶级、农民群众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国际，工人阶级、农民群众同国际资产阶级亦即资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这两重矛盾实质是一个矛盾——无产阶级及其同盟军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不过它不是局限在孤立的某一个国家内，而是成为国际性的矛盾，成为贯通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贯通东方和西方的共同矛盾，它是西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延伸和全球化。虽然，东方国家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要比西方复杂得多，除了上述矛盾之外，还有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并且因此决定了这些国家特殊的革命步骤。然而主导性的矛盾则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与资本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旧中国的“三座大山”有两座属于资本主义范畴，认识这一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我们党成立初期，中国已经有与近代工业相联系的产业工人二百多万，比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产业工人还多几十万；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约有一千二百万；再加上农村无产阶级（雇农），全国无产阶级的总人数约有几千万，是一个力量相当强大的阶级。除此之外，还有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半无产阶级（即贫农），其数量约有三亿之多。半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地位接近，他们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仅受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受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这个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队伍，就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扎根的社会基础。他们需要什么“主义”，就是中国需要什么“主义”，他们要走的道路，就是中国要走的道路，任何政党和个人，违背这个数量庞大的队伍的意志，必然要归于失败。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次革命之所以归于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显而易见，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地位，决定他们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他们决不会同意用一种新的剥削关系代替旧的剥削关系，用一种新的政治压迫代替旧的政治压迫，决不愿做帝国主义的“顺民”和廉价劳动力。这种选择，并不是历史上老早已经有过的那种社会公平思想的简单再现，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经济、政治和阶级关系的必然反映，同时也是对自鸦片战争以来历次革命斗争和种种救国方案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而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情与中国较为接近的大国取得胜利的事实，大大鼓舞了中国人的信心，坚定了他们的信念。“走俄国人的路”，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必然结局。

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亲和力，决不是什么人主观鼓吹的结果，而是中国社会的客观要求。

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社会，不仅是中国社会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本身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它诉诸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要求从现实社会的普遍联系中，从全球整体性出发去考察各个国家的革命问题。阶级性和科学性都决定马克思主义不能不关注东方落后国家广大劳动人民的命运。东方社会并不处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视野之外。

早在马克思主义诞生时，就已经同时诞生了这样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

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②

马克思恩格斯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不断关注落后国家的革命问题，研究他们的学说在这些国家的适用性问题。他们曾经指出，《资本论》关于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的描述，并不是一切民族都注定要走的道路。像俄国这样还保存着村社制度的落后国家，由于“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③他们还曾经预言：“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④

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强调落后国家与工业国家并存而互相影响的情况；二是确凿无疑地指明了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和实践了马恩的上述思想。他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思想，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和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思想，并且领导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做出了榜样。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东方国家更加贴近了。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社会，也是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真理作出的选择。

事实证明上述选择的正确性。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以科学理论为指南的、代表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利益的、有严密组织性纪律性的先进政党的领导，中国人民才有了自己的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司令部。结束了以前历次革命斗争或者没有自己的政党，或者有党而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政见分歧、组织涣散的状况。从此以后，中国人民才有了观察国家命运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有了正确的阶级观、国家观、革命观，解决了以前历次革命未能解决的一系列问题，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彻底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苦难深重的历史，走上了繁荣富强的道路，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当今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力量。

结合是复杂的创造性工程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不是简单地把两个东西“对接”起来，而是一项复杂的创造性工程。

在我党历史上，确实有过（不止一次）对这个问题的简单化的理解和做法。其基本特点就是机械地用理论去框套现实，或者让现实就范理论，企图在二者之间实现天衣无缝的“对接”。显然，这种对接是不可能成功的。道理很简单，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不是机器的两个部件之间的关系。理论不可能包罗无遗地反映实际，理论所概括的共性与实际所显示的个性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理论运用于实际总要经过创造性的劳动，实际在变化，理论在发展，二者都处于动态之中。如果刻意去搞“对接”，只能徒劳无益地在下述两个极端中摇摆：要么把理论绝对化，导致对现实的怀疑；要么把现实简单化，导致对理

论的怀疑。在我们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中，就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有的同志用马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预言逐条与我国社会进行简单的“对接”，结果得出了我国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错误结论；而另一些同志又因我国现实不能与马列预言完全“对号”，而怀疑科学社会主义是不是科学。

结合是创造。是在实践基础上把理论与实际、共性与个性、坚持与发展具体地、历史地统一起来的过程，是一项包含着复杂矛盾的浩繁的工程。概括地说，它必须科学地认识结合的两个基本方面，正确地处理结合的两个基本过程，并且要随着实践的发展把握好它们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

讲结合，当然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是中国国情。没有对这两个方面的正确认识，谈不到正确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们思维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解放事业的旗帜，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行动指南。它博大而精深，完备而严整。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也作为认识对象，科学地进行研究和领会，才能实现它与各国实际的结合，发挥它改造世界的威力。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把它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来对待，完整地、准确地、发展地认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α）历史地，（β）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⑤如果不是完整地、准确地、发展地去认识马克思主义，而是一知半解地以偏概全，实用主义地断章取义，粗枝大叶地望文生义，或者武断地封闭真理，都会偏离马克思主义的真谛，破坏它与实际的血肉联系。我党历史上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有着深刻的教训，特别是“文革”时期，片面化、形式化、绝对化以及对马列的误解、曲解盛行一时，严重地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完整性，破坏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因此，下大功夫系统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掌握其立场、观点、方法，融通其基本原理，通晓其历史条件，是实现结合的基本前提，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

中国国情是实现结合的另一个基本方面。毛泽东说过：“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⑥

但是认识国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认识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的国情，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生于斯，长于斯，未必知斯。”且不说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未能深知中国国情，就是共产党内的一些人也不懂得中国国情。“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者，其共同特点都在于对中国国情的无知。

要正确认识国情，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社会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研究。国情是什么？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传统；是过去、现在、优势、劣势、趋势；是阶级关系、社会结构和国际环境；是社会和自然的综合，历史和现实的统一；是繁杂的现象和现象背后的本质，是纷乱的矛盾和矛盾中的主索。只有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起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才不致被一大堆现象和数据所压倒，才能临高望远，纵览全局，抓住主题，确定中心，达到科学的认识。这是一个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创造性工作。没有这一项工作，谈不到什么“结合”。我党的幼年

时期，全党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整个说来是比较肤浅的，因此导致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挫折。以后总结经验教训，重新认识中国国情，在取得科学认识的基础上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由于对变化了的国情缺乏新的认识，在一段时间内脱离实际，搞“大跃进”，刮“共产风”，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结果又栽了跟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又一次重新认识国情，并以此为根据制定出改革开放的路线，从而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可见认识国情的艰难和重要。

如果说，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是实现结合的基础。那么，正确地处理结合的两个基本过程则是结合的主体工程。所谓结合的两个基本过程，一个是从一般到个别、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另一个是从个别到一般、从实践到理论的过程，二者是一种双向创新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是一般原理。要使它发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作用，必须把它具体化，实现由一般到个别、由理论到实践的转化。各个国家的情况千差万别，每个国家的情况千变万化，在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各个国家各个时期的时候，没有这种具体化的工作，同样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的结合。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无疑地只是借用了阐明社会关系所必需的宝贵方法，所以他们在评判自己对社会关系的估计时，完全不是以抽象公式之类的胡说为标准，而是以这种估计本身的正确性及其与现实的相符合为标准的。”⑦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体化的过程，就是在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基础上，找出中国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点，制定出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个过程，就是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也即用普遍真理能动地指导具体实践的过程。这是实现结合的基本形式，它包含着艰辛的创造，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改变形式，充实内容，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设桥梁，由此达彼。其间必须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我们党在这方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譬如，无产阶级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是一条基本原理。但是这条基本原理必须根据各国的国情加以具体化，才是有用的。俄国无产阶级以在中心城市发动武装起义，然后波及全国的形式贯彻了这条原理。而中国共产党经过试验比较，采取了与俄国人截然不同的形式——在反动力量薄弱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实践证明，这是唯一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它毫无疑问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伟大创造。再譬如，通过合作化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但这条原理也必须依据各国的国情加以具体化，才是有用的。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国国情，采取了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合作社形式——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引导几亿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总结了合作化后期以来，特别是“公社化”的“左”的教训，又在广大农村推广了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有统有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合作形式，并因地制宜地伴之以其他多种形式，迅速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显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农民的一个伟大创造。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过程，不但是从一般到个别、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而且也是从个别到一般、从实践到理论的过程。前者是运用形态的创造，后者是理论形态的

发展。没有后者，结合必然是不圆满的，它会使理论落后于实际，使结合失去后劲，最终导致二者的分离。

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中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然遇到许多在马克思主义中找不到答案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依据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独立地进行探索和总结，创造出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在我党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两度飞跃，其基本特征就在于在一系列理论观点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在实践中独立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道路、步骤和前途等问题，创造出了一套崭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十二大和十三大，我们党依据新的实践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理论、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理论、用“一国两制”促进祖国统一的理论等等，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毛泽东曾经说过，每个时代都要创造出适合自己时代的理论来，单有马克思的著作，没有列宁的《两个策略》，就不会有俄国革命的胜利。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单有马克思、列宁的著作，没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就不会有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单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没有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就不可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总之，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就不可能实现两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两个基本方面，两个基本过程，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不断变化的整体。中国实际离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只是混沌而盲目的实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离开中国实际，只是空洞而抽象的理论。从一般到个别、理论到实践和从个别到一般、实践到理论，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兼顾的两个方面。只有坚持第一个基本过程，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才能变成有血有肉的、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也才会成为科学理论指导下的自觉的实践，同时为第二个过程创造了条件。而只有坚持第二个基本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才会成为不断发展的、生机勃勃的理论，革命和建设事业才能在不断发展的理论指导下健康发展；这个过程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第一个过程。两个过程并行不悖，互相补充，构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统一过程。离开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导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分离，导致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挫折和失败。必须看到，国情在变化，实践在深入，从一般到个别要不断创新，从个别到一般也要不断创新。我们的任务就在于驾驭这个动态的体系，不断解决新的矛盾，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具体、历史的统一。毛泽东的“两论”从哲学上总结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经验。他在《矛盾论》中指出：“这一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⑧他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⑨所以，一般和个别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成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和基本途径。

必须在两条战线上作战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不断地同两种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一种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下，把马克思主义封闭起来，拒绝实践对它的发展的左倾教条主义倾向；另一种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下，借口形势的变化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

这两种倾向是一种伴生现象。在思想上同出一源，政治上互为帮手，并且往往交替出现。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是理论与实际、共性与个性、坚持与发展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它以承认理论与实践的差距为前提，以解决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为任务，以推动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为目的。但是上述两种倾向则不是这样，它们都以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际相脱离为特征，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关系。“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除此之外，别的都是鬼话。”

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来说，有时候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是主要的，有时候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是主要的。如果说第二国际时期右的思想是主要危险，那么，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左”的思想逐渐构成了主要危险。马克思主义被教条化，某些领袖人物的讲话被绝对化，社会主义模式被单一化。结果使马克思主义与实践拉远了距离，使某些领袖人物疏远了群众，使社会主义陷入了僵化。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之所以受到右的方面的攻击，与左倾教条主义的长期危害有着直接的关系。左倾教条主义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批判性，制造了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从而为右的营垒提供了口实和武器。“左”帮了右的忙，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左倾教条主义的特点，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类似教义的东西，只能信仰，不能发展。凡是马列经典著作中说过的，便是绝对真理；经典著作没有说过的，别人就不能说，不能做，甚至不能想。

这种做法必然造成以下几种社会心态：一是敬畏心态。对马克思主义或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敬而畏之，不敢提出问题，思考问题，争论问题，即使心存疑窦，也只好藏在肚子里，以免招来政治上的麻烦。二是依赖心态。既然马克思主义绝对正确，包医百病，那就可以躺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过日子，遇到问题，只须从经典著作中翻寻若干语录，便有了最权威的答案。久而久之，养成一种懒汉习惯，形成一种僵化学风，注经释道，照搬照抄。三是盲从心态。只要是马克思主义书本上说了的，或者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说了的，句句是真理，照办就是了，根本不用动脑子问个为什么。

社会一旦陷入这样几种心态，就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最主要的是社会思维凝固化，创造精神被窒息。几百万人，几千万人，甚至几亿人、十几亿人的聪明才智被窒息了。他们可以违背常识众口一词地宣扬某种错误观点；可以一哄而起地按照少数人或个别的主观意志，做出惊天动地的错误事情。这样哪里还会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呢？

所以，我们对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必须坚持进行反对左倾教条主

义的斗争。

然而,现实提醒我们不得不注意的是,在我们清算“左”的错误的时候,右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又冒了出来,乃至形成一种气候,前几年甚至达到了泛滥的程度。

这股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借口近几十年人类历史发生的新变化,借口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借口社会主义在前进中出现的若干曲折和失误,提出了“过时论”、“变形论”、“有害论”、“多元论”、“代替论”等观点,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在这股思潮的代表者看来,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不是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动力,而是证明了理论的错误;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的产物,不能解释当代的问题,已经“过时”了;毛泽东思想是“变了形”的马克思主义,有害而无害;马克思主义“独占”的指导地位应该让位于“多元指导”;应该用一种新的理论“代替”马克思主义。这股思潮不仅有国内的背景,而且有国际的背景,它是国际范围内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反映和组成部分,是国际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面对这股思潮,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进行反驳,并且要坚持长期的斗争。否则,就会动摇我们的科学的指导思想,使我们的事业脱离正确的方向,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辛劳动所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就会遭到破坏。

其实,当今世界的现实,不仅没有证明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相反,它证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矛盾虽然在形式上有某些变化,但仍然尖锐的存在着,而且形成世界性的矛盾。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出现的若干失误,并不是因为坚持了而是因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而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直接产物。离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离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离开建设社会主义要因国而异的基本原理,离开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几个基本特征,就没有我们这10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没有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和社会的安定团结。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是两种错误倾向的直接对立面。它既反对借口坚持否定发展,又反对借口发展否定坚持,把坚持和发展始终统一在一起。而坚持和发展统一的基础就在于实践。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是主观上有这个需要,而是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主观上有这个需要,而是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适应实践发展的要求,解决实践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推动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向前发展。坚持和发展都由实践赋予动力,由实践展现过程,由实践检验结果。只要我们是忠实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的,我们就必然是坚持和发展的统一论者。

应当看到,由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将长期并存,由于国际上反马克思主义势力将长期存在,还由于任何真理包括马克思主义都只能在曲折中发展,而人们对于真理和客观事物的认识不能完全避免直线性和片面性,在认识运动的螺旋形曲线中,往往把某一个片段绝对化,用一个极端去反对另一个极端,因而“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将会长期存在,并往往交替出现,干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结合。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坚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反“左”时防

右，反右时防“左”。

党的70年历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两度历史性飞跃，推动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并没有就此结束。结合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的结合不能代替社会主义时期的结合，那么，今天的结合也不能代替未来的结合。结合的运动规律决定它不可能一劳永逸。我们必须继续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我们坚信，在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指引下，在党和人民的团结奋斗中，中国社会将会发生更加伟大的变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一定会变成壮丽多姿的现实。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

②同上书第8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5—436页。

④同上书第326页。

⑤《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8页。

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96页。

⑦《列宁选集》第1卷第59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8页。

⑨同上书第284页。